



尹昌龙
著

当代中国文学思潮中的话语类型考察

重返 文学自身的

中国当代学院批评丛书

谢冕 主编 程文超 副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返自身的文学:当代中国文学思潮中的话语类型考察/
尹昌龙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9
(蓝风筝·中国当代学院批评丛书)

ISBN 7-218-03153-6

I. ①重…②蓝…

Ⅱ. 尹…

Ⅲ. 文学语言-话语(结构主义)-研究-中国-现代

Ⅳ. I 045

书 名	重返自身的文学 ——当代中国文学思潮中的话语类型考察
作 者	尹昌龙 著
责任编辑	黄彦辉
封面设计	舒 杰
责任技编	孔洁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9.625 印张
字 数	230 千字
插 页	1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218-03153-6/I·382
定 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总 序

谢 冕

这套丛书的几位作者都来自学院，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获得了很高的学位——丛书中有好多部本身就是博士学位论文。而且，丛书的大部分作者，现在也都在大学或研究部门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这套丛书的内容，是围绕着中国当代文学这个基点展开的，可以说是属于广义的文学批评的范畴。因此，要是这套丛书加以概括，指称其为《蓝风筝·中国当代学院批评丛书》，应该是很切题的。既然是学院批评，而且又与“当代”有关，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当然也乐于把话题集中在当代的学院批评精神这一点上。

学院在中国可以称之为高等学府，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在全体居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中国，学院这地方相对集中了拥有较多知识的人才，这本身就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中国旧学也有学院的传统，那是以某一位或数位知名学者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书院制度。在这些书院中，通过那种课徒授业式的讲学活动，以交流学术、传播思想。书院在中国旧时的文化交流和学术发展中，特别是在倡导独立思想和建立学派方面，曾经起过非常大的作用。现代意义的学院，源起于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它发端于“戊戌变法”而逐渐完善于新文化运动，是现今综合性大学的雏形。

现代的学院是新型的综合性的高等学府，与世界各国的大学体制相近。在中国，这种集中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学院，往往是学

术活动频繁、学术思想活跃的地方。这里也是产生新思想和新思维的场所，从这里发出的信息，往往能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对社会产生着积极而广泛的影响。在大学里酝酿和产生的先进的思想，往往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的精神资源。学院以及学院里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殊地位，已为近代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实。

中国学院的这种品质，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魅力的展现。学院的地位和它的实践，昭示着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由于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的紧密联系，因而，在学院中形成的思想理念，总是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迅速或缓慢地对社会和人群产生着影响，积极地作用于现实的进步与民智的开发。

在文化未能普及的社会，学院的成员是经过严格筛选的。优秀人才的相对集中，使这里弥漫着浓厚的投入和参与意识。这种意识以表达广大民众意愿的社会理想为巨大支撑，它保留了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联。学院意识的成熟性，表现在它与社会盛衰、与民众忧乐的紧密联系上，它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最动人的一道风景。中国的知识分子很清楚自己在全体民众和整体文化构成中的这种地位，他们总乐于承载启蒙和代言的重负——当然，是通过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生活在中国具体的环境中，他们有一种被选择的庄严感。这种庄严感诱发并产生了使命意识则是自然而然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总要求自己的工作有益于人、有益于世，他们有很强烈的社会功利心。在中国，学问从来都不“纯粹”。

学院是切磋学问的地方，当然与外界有不同之处。首先是，这里所进行的一切工作都与基于个人的创造性劳作有关——而且这种劳作偏重于精神的和思想的层面。这是一个与外面偏重于务实的世界相对游离的社会。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独立的，这里的工作立足于思考的独创性，它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掘一个人的潜力，使每一个人的智慧发挥到极至。这里无保留地鼓励

奇思异想和与众不同。

无论是求学还是治学，其核心是探求学理。学院精神之所以能对社会产生影响，究其实，就在于它的思想理念建立在科学思辨的基础上。它不排斥激情，而激情却诞生于冷静的分析，并以坚实的理性为前提。这里所进行的一切工作都面对着具体性，事实和材料无疑是立论的根本。把这推广到治学上面来，则一切的推论或判断都应当是有根据的。不务空谈，严谨求实，是这里不可更易的律则。

学院的基本使命在于发展。它不仅是接受前人的思考成果，而且有责任推广和发展前人的成果。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并非被动地接受，总是追求以自己的加入而使历史丰富。中国学术就是在这样的精神接力赛中得到延续。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成员都以能通过自己的思考和研究进入学术的创造性传统而引为荣耀。正是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和所理解的学院精神总与创新有关。说学院是做学问的地方，此话不错。但它是一道鲜活而浩大的长流水，靠的是源头的深远，也靠的是加入者的鲜活的输送。

回到这套丛书的话题上面来，这里集聚的几本著作涉及的内容，均立足于20世纪、特别关注于本世纪下半叶以迄于今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潮的研究观察。既然是以当代文学的观察为重点，这里当然充盈着对于现实的关注和激情，为它取得的成就，也为它曾有的失误。中国文学在本世纪所经历的一切，尤其是本世纪后半叶所经历的挫折，为近现代文学的历史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经验。时届世纪末年，文学则有亟待克服的积重和新的期待。文学需要回应生活提问的也更多。在这样的处境中，一方面，文学研究需要对以往的累积作出有效的清理，另一方面，则要以更多的毅力和锐气面对新的挑战。这无疑是当代的学院批评的严重的任务。

本丛书的作者大体总与北京大学有关，他们中的多数人都获得过北大的博士或硕士学位，他们是很有创造力和锐气的新一代学者。奚密教授情况略有不同，她是我的朋友，现在就职于戴维斯加州大学。她是中国当代新诗热心的研究者和权威的诠释者，她在这方面的贡献，得到国内和海外学界的公认。她的加盟为本丛书生色不少，在此，我谨向奚密教授致谢。本丛书的大量组织工作是程文超做的，我也向他表示谢意。当然，我还要代表全体作者向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丛书的责任编辑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1999年2月16日，旧历己卯年正月初一，于北京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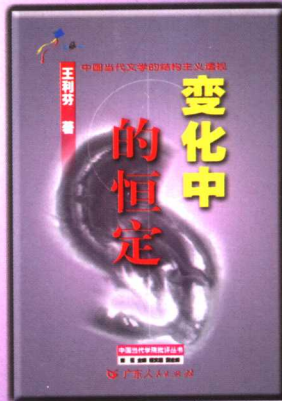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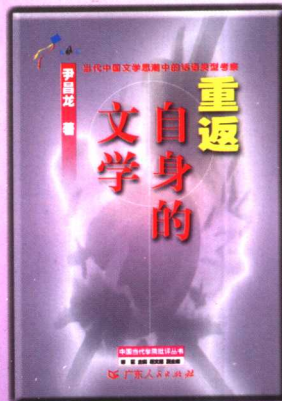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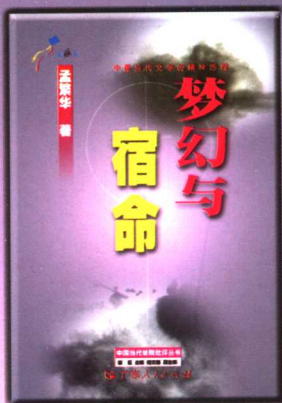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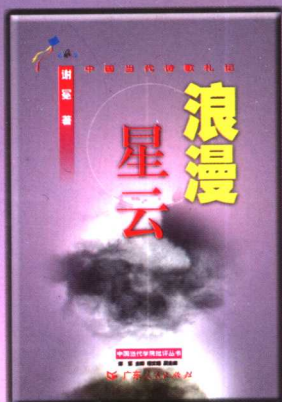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尹昌龙，1965 年出生，祖籍安徽省和县。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研究，发表有关论文多篇，撰写并出版《1985：延伸与转折》等专著。现任职于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当代学院批评丛书

谢冕 主编 程文超 副主编



目 录

导论 走入历史的当代文学·····	1
第一章 我们怎样对文学说话·····	12
一、“文学是什么”：一个值得疑问的 疑问·····	14
二、最低限度的设定：必要的想象·····	21
三、我们怎样对当代中国文学说话·····	27
第二章 重返的道路与想象的自身·····	41
一、我们从什么意义上谈“文学重返自身”·····	43
二、反叛的文学：作为一种重返的话语·····	48
三、重返文学的总体语境·····	52
第三章 政治性话语：作为文学实践的考察·····	64
一、政治的总体化与文学的规范性·····	66
二、“谁在说话”：“立场”的要求·····	70
三、激进的政治与“落后的”文学·····	76
四、政治性话语生产方式的分析·····	79
五、“文学即政治”：文学的“诡计”·····	85
六、重读《讲话》：回到文学中的解释·····	90
七、寻找文学的“专名”·····	94
八、国家叙事中的个人话语：当代诗歌创作中的 个案分析·····	99

第四章	“真实性”话语：面向现实的诱惑	114
一、现实主义：知识的源起		116
二、真实性话语：在政治性话语之上与之外		123
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危机中的定义		128
四、走向真实性：民主进程中的文学实践		144
五、“写真实”：干预生活的策略		148
六、重返现实主义：问题与策略（之一）		155
七、重返现实主义：问题与策略（之二）		162
八、新写实：“作者”的消隐与“真实”的到场		169
第五章	“人”的话语：作为人学的文学	180
一、人道主义的初潮		183
二、“人”的话语与“真实性”话语关系的逻辑考察		189
三、“人”的文学的抒情性		194
四、“人”的话语：知识分子的立场		199
五、“中间人物”：间性的主体		206
六、“向内转”的文学		213
七、文学的主体性：“人”的话语的“终极”形式		217
八、人学与文学的分野		220
九、“特权”之外的人文主义		224
第六章	“现代性”话语：不稳定的文学实践	234
一、“现代化”的焦虑：国家化的表述		236
二、现代性话语：隐约的质疑		246
三、重返文学自身：现代性建构		253
四、民族现代性的建构：文学的文化战略		262
结语	游戏的终结与精神的上升	272

导论 走入历史的当代文学

作为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我的意图是论题要尽可能地具有历史感，就是说要具有一定的时间上的跨度和内容上的广度，然后通过一种相对综合的、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考察，得出某些具有一定涵盖性的认识。这也正是我的导师谢冕先生对我论文写作的一个要求。

如何获得一种具有历史感的研究对象呢？这当然首先要从我们从事的学科方面来考虑。中国当代文学处在不断变动和发展中，虽然它在过去已经发生了，但现在它还在生成着。作为正在延续的实践活动，它似乎还没有找到一个停靠的站台。这就使得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始终处于一种行走之中的追踪状态，并难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历史感和相对严格的规范性。当黄子平戏言“新时期文学这只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停下来撒尿的时间也没有”时，我特别能理解其中与学科建设、学术规范相联系的一种焦虑。尤其是当我在进行博士论文写作时，痛感历史感和规范性对于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必要意义。

虽然像浮士德那样对着变动的世界和流失的时间大喊一声“停一停”已是不可能，但这不能否定我们从变动的时间和状态中获得历史感。这一点可以从人们对当代文学实践的体认中得到验证。在新时期文学之初，当代文学研究者普遍的印象是，当代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至少与现代文学相比缺乏一种深度和价值，而

且，文学性资源极少。如果按此而剔除被认为是空白化的“文化大革命”阶段，当代文学也只有从建国初期到1966年的十七年左右的文学历史。其中，新时期文学当时才刚刚开始，难以进入当代文学的历史，同时，“十七年”的文学因为“反右”等政治运动的干扰，许多作品是勉强才能作为文学历史的研究对象的。然而，当代文学发展到90年代，发展到世纪之交的时刻，人们对当代文学“浅”“薄”的印象便得到了大大的改观。一方面，从时间跨度上看，中国当代文学如果从1949年这一大致的起点算起的话，已经走过40多年即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了，与现代文学30年相比，当代文学的内容更为丰富，这样丰富的内容和悠长的跨度，为这一学科的历史研究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证；另一方面，从演进阶段看，当以“八五”新潮为标志的新时期文学渐渐失却轰动效应，并结束了最为闹热和繁盛的时期之后，当代文学也大体上实现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对接，这一对接因为一种对“五四”的眺望，因为一个世纪的总体叙述的某种成形而获致了纵深感，而这种朝向“五四”的历史纵深感，又促进当代文学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渐趋成熟起来^[1]。这种成熟于历史意识中的文学，又因其对新时期改革开放现实的参与和体察，而获得了“当代性”。

当代文学研究历史感的强化，同时是与一种时间分期、知识分类的要求相贴合的。比如，把“当代”与“当前”加以区别，使“当代”相对固定而“当前”相对流动；把“当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学批评”加以区别，使“当代文学”在历史感中强化学科性、专门性，而使“当代批评”在当下语境中强化敏锐性和批判性^[2]。还有一种颇为新奇的看法是，给“当代”这一概念加上“后”的前缀，使“当代”与“后当代”区别开来，把正在发生着的文学现实和将要发生的文学未来让渡到“后当代”这一时

间领域和概念空间中去^[3]。所有这些分期、分类的要求，显然出于这样一种愿望，即通过一种区别和差异性，把“当代中国文学史”给固定下来，拒绝再度漂流，并把漂流的可能性让渡出去，抛入未来。通过与“当前文学”、“文学批评”、“后当代文学”相“断裂”（这一断裂在某种程度上是想象性的，并且只是某种隐约的痕迹），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们体现出某种日益显明的学科意识和历史感。

既然论述对象是带有整体性和历史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那么首先面临的是内部打通的问题。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打通的愿望早就被提出过，并且这一愿望一直被切实努力着^[4]。然而在当代文学内部打通的问题却反而受到相对的忽视，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因为新时期与“十七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之间在政治意识和政策方向上存在巨大的差异性而使二者之间较少归类的可能性，较多归类的难度，另一方面因为新时期文学与现代文学、五四文学较多对话，或者更远地与传统文化、古典文学较多对话，却反而相对忽略了与解放后、“文化大革命”前文学的有意识对话，因而似乎没有某种共同的“知识共因”。然而，如果当代文学内部不被打通，那么打通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设想也难以实现，否则当代文学的某一阶段或某一种类会成为 20 世纪文学史中隆起的硬块（比如“文化大革命”文学），难以被抹平，也就难以纳入到一个上个世纪末开始的总体化的文学运动中去。如果这样的话，写作 20 世纪文学史的理想也就永难缝合。而对于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来说，立言写史无疑又是一个难以掩饰的愿望，并且这种愿望又反过来验证着某种志文志史的知识分子身份。准乎此，本书就力图打通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某些内部环节和障碍作出努力，至少以某些视角的连贯性来统接当代内部被不同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变

革所隔开的文学阶段和文学类别。当然，这些宏观的视角又是从某些具有共同性的问题入手，比如“写真实”的问题，这一问题又与横贯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思潮相联系。然而又正因为如此，本书与其说是在写一种当代文学史，不如说力图为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做些整理性的工作，理清某些思路，说明一些问题。当然，如果能达到所说的这一效果，则是在期望之上了。但我相信，这一整理性的工作对文学史的写作是必要的、有意义的，而且因此是艰难而富有挑战性的。

当代中国文学因为与社会、政治、文化的深刻相关，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又是中国当代史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彭瑞金在谈到台湾当代文学时曾说：“战后四十年间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经历许多不同的变革，除了文学应和内在的律动，为求变求新而动外，台湾文学的发展无法和台湾时局加以区隔，也是台湾文学所以呈现奇谲多变面貌的主因。”正因为“文学以外的非文学因素，包括政治力、经济力的对文学的影响，一向都是直接而绝对的”，所以他认为“文学和历史、现实的交融已经成为台湾文学的一种性格”^[5]。事实上，彭瑞金所说的台湾当代文学的这一性格，也是整个当代中国文学的性格。当代中国社会巨大的政治变动、经济变动都对文学的运作方式和表现内容产生非同凡响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种影响，所以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超本文的研究或者说是潜文学的研究。应该注意的是，政治、经济等等社会变动，是通过文化的形式来作用于文学的，并且文学文化的变动也成为整个社会文化变动的组成部分。所以，超文本或潜文学的研究，也就指示着文化分析的方法。伊格尔顿曾经说过：“我自己的观点是，把文学看作是一种名称是最为有用的，人们因为各种原因不时地给某些写作以命名，这种命名是在一个整体的领域中进行的，米歇尔·福柯已经称之为‘话语实践’，如

果一切都将成为研究目标，正是在这个整体的实践领域，而不是有时被奥伯斯库比贴以‘文学’标签的那些事物。”^[6]安托尔·埃斯普和凯特在编辑《批评和文化理论读物》一书时，就曾经受伊格尔顿这一思想的影响，着眼于“文化意指的实践”，文学作为目标也包容于这一实践之中，“并被放置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中进行转换”^[7]。同样地，在本书中，我也力图用一种文化研究的方法，把对文学的考察放到整个文化语境中来进行，通过对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的认知，从而确立当代中国文学的性格和面貌。从这一角度看，这种文学研究似乎不是纯粹的文学研究，而有些类似于赵一凡在探讨后现代主义历史时所称的“潜文学研究”或“泛文学研究”，这一研究格局“由新批评转入符号逻辑，结构语言及解构主义，大体沿着维特根斯坦、索绪尔、雅各布森、德里达等人足迹向纵深掘进，直到福柯式结构主义阐释理论阶段才落地的，同泛化的文化研究趋于共进”^[8]。事实上，福柯的思想将受到借鉴，并在行文中多次得到体现。我们知道，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中，特别是前期确实存在着文学性不高的问题，有某种为激进的政治运动甘当传声筒并在政治运动中被边缘化的迹象。有意义的是，这种文学性不高的事实对思想性研究有所助益，从而使这种文学研究获得了思想史含义上的特别价值。显然在今天看来文学史上种种荒唐而愚昧的行为让人厌恶，但正如杰克·康罗伊所说的：“遍翻以往急进运动的历史，研究者们除了瓦砾和废墟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发现。然而一个有着那么多睿智豁达的男人和女人参加的运动，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不能不承认共产主义思想对那些甚至并不接受这一思想的作家所起的巨大作用。……我们活到60年代的人可以遗憾地指出当时人们存在的弱点和失败，他们浪漫主义的幻想和热衷于自我欺骗，他们的自负和优柔寡断。但是，不论他们犯了多少错

误，要是轻蔑地否定他们改变世界的尝试，却不是那么容易的。”^[9]我们站在 90 年代的位置上，显然有一种时间上和文化上在场的优势，但这丝毫不能影响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细致的、严肃的研究态度，任何自鸣得意的轻慢都可能是面对历史的另一种形式的无知。而且，从思想史的价值来说，当代文学的历史至少给我们以启示。

我们刚刚表达了一种从文化对文学作用的角度来考察文学史的意愿，那么接下来要讨论的是文学对文化的作用和作用方式。

海耶克在分析社会思想发展时指出：“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它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10]虽然他有些夸大了观念对于历史的反作用力，但是毕竟让人们理解到思想在历史发展中非同寻常的意义。在中国当代文学和社会的历史中，政治运动往往是从文学运动开始的，就是说政治思想首先通过文学思想来表达，这虽然是一种政治运动的策略，但同时也表明文学思想的触发力量和涵盖作用。在这种时候，文学思想绝不仅仅是软弱无力的，它同人类其他形式的思想一样，直接具有推动社会行动的力量，就像约瑟夫·祁雅理所说的：“人的思想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抽象，或某种在人类日常生活中飘荡的风筝。思想是人类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它是从日常生活中产生出来的。思想既反映日常生活，又改造日常生活。人的思想的各种动荡是文化的动荡，也是历史的动荡，文化与历史的动荡引起人的思想的动荡，也受到这些动荡的影响。”^[11]从文学思想与历史行动相关的角度考察，我们显然会被文学干预历史的方式所吸引，这里且不说作为文学类型的干预小说、改革文学，单单“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就足以说明文学活动是以历史事件的形式成为历史，尤其是在那样一种转折的关头。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在产生一种类似于名教的文学崇拜，或者像保罗·德曼那样设立文学的祭

坛^[12]。我们想要说明的是，文学与文化或社会之间始终存在着过从甚密的关系，这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尤其如此，而只有从这种关系出发并对之加以考察，才有可能获得相对完整的历史视野。

当 R·玛格欧纳在讲到海德格尔关于“艺术是一种活动存在而不是客观存在”时，指出“诗化的语言把存在从寂然中唤醒。作为一种‘唤起’，文学作品是一种行为、一个事件、一种发展过程。文学‘作品’已是这样‘一种活动方式’”^[13]。当玛格欧纳说到文学作品是行为时，说的正是“文学作品”或“诗化的语言”这一行动的主词。这让我们想起维特根斯坦的话“言词即行动”。从这一角度看，文学与社会或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恰恰是以语言的方式和作品的形式出现的，这就难怪布洛克曼从结构法则的方面来考察文学行为与社会价值的关系了。他说：“文学被揭示为一种按照社会价值体系产物的法则而不断变动的过程。每一种文学活动的以及每一种言语行为的结果，都是一段本文。”^[14]而社会现实与文本现实的一致性恰恰是体现在结构上。由此，我们对文学与文化或社会的关系的考察将集中在对文学话语行为的研究上。对于文本、言语等等语言学或叙事学的概念来说，“话语”一词无疑具有涵盖性，并因之而成为文学考察的一个基本的范畴。话语一方面指涉语境特征，由此把文学话语与社会语境勾连起来，另一方面指涉言说动机，由此把文学话语与历史意志连结起来。而当我们在考察当代中国文学时，恰恰是从考察当代文学的话语出发的。

从话语的角度来考察当代文学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具有意义：

(1) 使当代文学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文学史研究的类型。从话语形式出发，最为接近文学的言语特征、叙事特征，就是说文学的意识形态的或思想的考察因此而落实在形式对象或言说对象